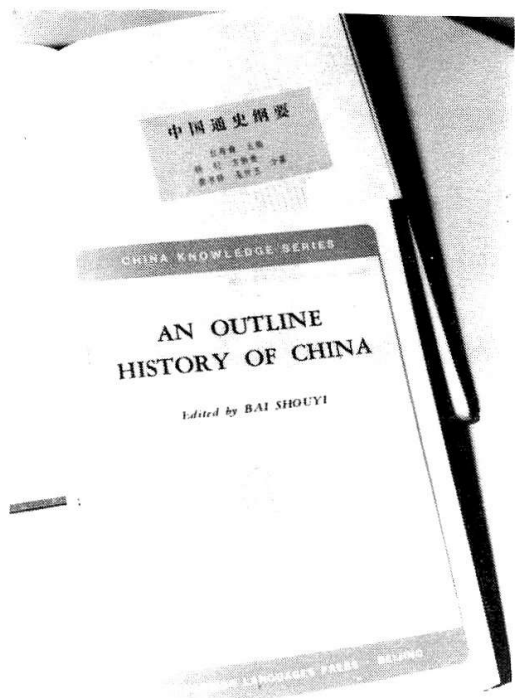


白壽彝對中國歷史的看法

任致遠著
劉賽眉譯

一九八〇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壽彝所編著的「中國通史綱要」，兩年後（一九八二年），北京外語出版社又出版了該書的英譯本，全書共五百六十三頁，附有精美插圖，該譯本之問世，令到對中文不稔熟的人士，有機會去發現一種在國內頗流行的對中國歷史的解釋。



不同的學派對歷史研究的工作有不同的解釋，沒有歷史學家可以自稱為完全客觀，白壽彝與他的學者同工對自己的立場亦毫不隱諱。在白氏的指導下工作的同工，包括有：楊釗、龔偉鐸、方齡貴、和朱仲玉。他們都信奉馬克斯及列寧主義，採取上述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追溯這偉大國家數千年來的歷史。

由於他們在探討中國歷史時所用的思想架構，令到他們特別強調歷史中的某幾點，例如：農民起義的次數及聲勢、人民的願望、不同政權下所產生的不正義。這本書讀後，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種看法不符合歷史事實，就是：它認為中國朝代的更替是源自農民的革命，農民的革命使到「天命」由一朝代轉到另一朝代，然而中國的情況却未因此而改變。

讀者不難窺見編者在編史工作上的破綻，他們被羈囚在某種主義的思想架構內，因此妨礙了他們去了解和分析在這思想框架以外的事物，中國歷史上的豐富遺產不僅因此而變相，而且亦變得貧乏。該書對中國古代的伟大哲學家未能予以正確的評價：「（孔

子)在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有不少貢獻。但他在政治上是保守的，是不能適應歷史潮流的發展的。」(見頁一百一十二)「……當然，這(墨子的哲學)只是善良的願望。但他反對命定論，是有進步意義的。」(見頁一百一十三)「……老子書中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……。老子書的作者看到了事物的矛盾及其轉化，但他以為事物的變化，不是發展而是循環的，對立面的轉化是對立的、無條件的。他企圖在主觀上消解矛盾，因而在政治上有無為而治的思想。」(頁一百一十四)

同樣，中國許多不同的精神和宗教傳統都受到低估，甚至輕蔑，貶抑為純粹的消極社會現象。編者對宗教的客觀事實、它在歷史中的演進、及它對社會的影響都一概不提，反而用了馬克斯主義中近乎教條主義的準則來批判它。對於回教及道教則輕輕抹過不提。該書不僅似有混淆基督教與整個基督宗教之嫌，而且亦把中國天主教與十七世紀的耶穌會士等量齊觀。原屬回族的白壽彝對利瑪竇及其同伴的評價尤其不佳：「他們把上帝的天國緊緊掌握在手裏，其實質是要把地上的王國踩在腳下。這跟殖民主義者的砲艦和鴉片，正是巧妙的配合，而跟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潮是尖銳的對立。」(見頁四百二十七)白氏及其同工抱怨他們把假科學帶進中國。(註二)事實上，許多中國的評論家都不敢如此判斷，雖然他們不贊成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，但對於他們在科學上的貢獻却很明顯地承認。(註三)

該書對佛教的某些批評亦很利害：「佛教的靈魂不滅，因果報應，轉世輪迴之說，可使人迷惑於來世的幻想而追求所謂精神上的解脫……。」(見頁一百八十六)他們似

乎同意無神論學者傅奕(五五五年至六三九年)的話，他說：「大批僧尼游手好閒，逃避租稅，使國家減少了收入和兵源，應當責令僧尼還俗匹配，從事生產，和養兒育女，充實國家的財源和兵源。」(見頁二百二十)上述種種使人懷疑是否文革的破壞性思想仍餘波未了。編者似乎並不賞識統戰的政策、宗教自由、和精神文明。看來，白氏所編的這本書對中國人本身亦有損無益，該書不但觀點狹窄，而且所用的方法也很難說合乎科學，因為它使讀者看不到許多不同的歷史真相、真正偉大的人物、以及啓發這些人物的動機。譬如：在歷史上，農民起義的性質及原因很不同，有些是地區性的；有些則由秘密社會所組織；更有些是爲了反抗外族勢力。因着時代和社會環境的不同，革命的需要亦不同。事實上，許多次農民革命都不是自發的，而是有組織、有系統和秩序的運動。

公元第十至第十三世紀可以說是中國的「啓蒙時代」，不少歷史學家皆很欣賞這個時代，因為這時期的中國，不但在文化上革新，而且在藝術、科學和哲學上也很發達。正如馬可孛羅所發現的，當時的中國比歐洲還要進步！白氏對這樣豐富的一個歷史階段不見得很欣賞，縱然在該書曾提及上面的事情，但編者們似乎更集中於把歷史的人物按自己的想法來分類，例如他以變法家王安石爲「哲學的唯物主義者」，沈括爲「唯物主義者」。而司馬光則被列爲是「保守主義者和維護宿命論的唯心論者」。程顥是「保守的理論家」。(見頁二六八至二六九)其實，編者是處在進退兩難的矛盾情況中，一方面，作爲馬克斯主義者，他需要負起批判君主政制的責任，另一方面，身爲愛國份子，又

極願抬舉中華民族。

最後尚有一例：編者一方面承認在第七世紀所建築的運河，對國家的統一和經濟發展均有利，但另一方面，對這項偉大工程的建築者和工程師却未予以半句讚美，更遑論對發動這項工程的隋帝楊廣了。他指責楊廣的水上作樂，指其為：「運河開道以後，楊廣爲了享樂，一再地游幸江都，更是大量地浪費了人力和物力。」（見頁二百零六至七）

白壽彝是一位有經驗的歷史學家。（註

附註：

註一：正如許多中國人一樣，編者在應用「基督宗教」一詞時，只限於景教及基督教身上。

註二：白壽彝曾有以下的評述：「耶穌會傳教士曾被稱爲西方近代科學的輸入者。這是不符合事實的。近代的自然科學是從神學中解放出來的自然科學，而羅馬教廷是反對近代自然科學的死敵，是迫害科學家的狠毒的凶手。耶穌會不可能不站在這種迫害活動的最前列，因而決不能想像耶穌會傳教士會把近代科學帶進中國來。他們對中國學人隱瞞近代科學的成就……。」（見頁四百二十七）

四）當他在編著該書時很可能是受到了文革時期的年青學者所影響，研究工作大概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中進行，很可惜的是，該書後來沒有修正就出版了。現在，文革的氣氛不斷地被公認爲不適合於真正的科學研究，因此，這本書也似乎很難對邁向現代化和尋求事實真相的中國有利。我們希望中國後來會出版另一些作品以補充該書的不足，同時亦讓真誠愛護中國的人士能夠發現中國歷史的豐美。

註三：甚至不太賞識傳教士的顧長聲亦說：「傳教士所介紹的科學文化知識，歸納起來，主要有天文學、兵工學、數學和地理學，儘管有一定的缺陷與保留，但對於填補當時中國的缺門，擴大知識面，豐富中國的科學文化，還是有一定的貢獻。」（見「傳教士與近代中國」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一年頁十）

註四：他的第一部著作「中國交通史」可在本中心的圖書館找到，於一九三七年由上海商務出版社出版。